



投稿邮箱: xzh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浮世杂拾

茹志鹃: 安忆是你们徐州的媳妇

◎王雪春

去年5月24日,王安忆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。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,她接过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亲笔签发的荣誉证书,和丈夫李章一起接受了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祝贺。这则新闻勾起了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。

我关注王安忆,始于她与徐州的特殊缘分。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黄河故道人》写的便是徐州的街巷与人物,读来令人倍感亲切,而她本人,更是名副其实的“徐州媳妇”。

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上海,母亲茹志鹃曾任上海市作协常务副主席,其作品《百合花》被选入中学课本;父亲王啸平是新加坡归国华侨,是编剧、导演与作家。1970年,王安忆下放到安徽五河县大刘庄村插队。1972年,从小学舞蹈的她考入徐州文工团,担任大提琴手。1975年,在男友李章的鼓励下,她写下散文处女作《大理石》,并获得发表。1981年,已返城上海工作的王安忆回到徐州,与李章领取结婚证。李章是徐州人,当时任徐州文工团音乐指挥。5年后,他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任编辑。时光流转三十余载,从他俩接受法国驻沪总领事祝贺的照片上看,两人的脸上溢满幸福。

我想起了1992年初秋,我在徐州日报社当记者时,去上海采访王安忆的经历。那时交通不便,绿皮火车从徐州到上海要十几个小时。我们坐的火车第二天早上5点多到达上海。简单地吃了一点早餐,便乘公共汽车赶往延安西路。

我的同事杨少华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到的王安忆。按照说好的时间,我们定好了前往上海的火车票。没想到王安忆时间临时变动,她要去新加坡,就在我们到达的当天走,不能接受采访了,接替的方案是采访她的母亲茹志鹃。

延安西路的一条弄堂里就是王安忆母亲茹志鹃的家。那时的弄堂里,有着浓浓的上海烟火气,早晨的人们用煤球炉生火做饭,一片紧张凌乱。但一进入二楼茹老的寓所,市井的喧闹顿时被关在门外。初见茹老,我立刻被她高雅的气质所吸引。67岁的老作家风采依然,气度非凡。她中等身材,身穿白毛衣,步履轻盈,精神矍铄,宽阔的眉宇间似乎充满了无穷的智慧和灵气。我看到了《百合花》里的那个下卫生所的“我”!

1958年,茹志鹃的短篇小说《百合花》一经发表轰动文坛。茅盾先生直接用“最满意、最感动”来形容,撰文称赞这篇小说“清新、俊逸”。在当时以慷慨激昂风格为主的战争文学里,茹志鹃细腻柔软的笔触反而一下子击中了人心,让英雄叙事有了更真实的人性温度,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。我以前是在课本上读到的《百合花》,现在见到作者本人,我觉得用“清新、俊逸”来形容她,

不仅不算过分,而且老作家看上去更加深沉、委婉、柔美。

访谈从茹老近况聊起。茹志鹃用白瓷杯为我们倒上茶水,慢慢吸了一口香烟,说:“我现在多是应付门市,写个序,前言什么的,字数不多,却挺烦人的。前年从上海市作协常务副主席、党组书记的岗位退下来,本想轻轻松松搞创作,没想到繁琐的事情接踵而来。我现在还兼任《上海文学》副主编、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的职务,其宗旨在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道路。我认为目前我们‘扫黄’,把‘黄’扫掉后有代替的东西,这就是通俗文学。但我们现在的通俗文学需要引导、研究、提高,不能永远停留在说故事阶段。”

茹志鹃极热情地一一回答了我们的提问,不时起身,在并不宽敞的房间里踱着步,看得出,这是她整理思绪时的习惯。

她的房间有20多平方米,简朴整洁。除了一部电话机,就再没什么现代化设施。我注意到床头一幅苍劲的书法——“煮书”。简洁的两个字,有力地表明了主人的意趣。

谈起她那全都从事文艺工作的家人,老作家兴致勃勃。上楼时,我注意到一楼半有个亭子间,窄小、黑暗的房间里有位老先生伏案疾书。落座不久,老先生进屋拿书,茹志鹃介绍说,这是她的丈夫王啸平,曾任前线话剧团团长、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导演,现在改行当作家,已自费出版《客从南洋来》《南洋悲歌》两部系列长篇,第三部正在酝酿中。

王啸平1940年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,这三部书主要写他的经历。已出版的两部在新加坡的反响很大。茹志鹃感慨地说:“老先生70岁了,写这两部书很不容易,因此无论如何,自费也得出版。我鼓励他一定要把第三部写完。”

茹志鹃有三个孩子,大女儿是上海金山电视台的编辑。二女儿王安忆是一级专业作家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。儿子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编导,儿媳是《桥》杂志社上海分社的记者。这样一个文学世家真不多见,所以茹志鹃、王啸平、王安忆三人联名签字售书,一时成为上海滩的新闻。

对于自己的创作成就,茹志鹃很谦虚,她说:“人家还记得我的一些作品,我感到欣慰,但同时也很惭愧,因为说来说去,不过是少数几篇自己较满意的。”但我却知道,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不会忽略茹志鹃这个名字。上世纪50年代她以细腻笔触的《百合花》蜚声文坛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以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又为她带来一片赞誉。后者被誉为“反思文学的发轫之作”。经历时间洗礼,茹志鹃后期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,冷峻的现实生活使她不再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

和同志关系,这种深沉的反思在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她一共出版过7本作品集。

我们的采访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。谈起二女儿安忆,茹志鹃充满自豪。她说:“安忆是你们徐州的媳妇,绍兴的外孙女。”

我问茹老,王安忆的文学道路是否是由她铺设的,茹老呷口咖啡极认真地说:“错了。当年我因写文章吃了不少苦,就极力阻止孩子们再走这条路。但我当时也从安忆每月两封的家信中发现了苗头,很担心她也走这条路。”

茹志鹃回忆道,那年身单力薄的王安忆来到举目无亲的皖北农村,心情可想而知。她有次在家信中写道:“这儿有个说法,燕子不到恶人家做窝,我观察了许多,没发现我住的农家有燕窝……”其无奈、愁苦的心情跃然纸上。第二封信的文笔更细腻、优美:“妈妈,今天早上一醒来,你猜我看到了什么?燕子!有燕子来做窝了。”在这两封信中,王安忆的写作能力初露端倪,即使母亲阻止,也没能扑灭她的文学热情。

至1992年,37岁的王安忆已有500万字的作品问世。

在当代文学史上,茹志鹃的籍贯记为杭州,茹老说,确切地说应该是绍兴,她祖父是绍兴人。前些日子王安忆去绍兴寻根,人家说她是徐州的媳妇、绍兴的外孙女。

告别茹老,心底油然而升起对这个文学之家的崇敬之情。这份情愫,延绵至今。

在中国文学界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少之又少。茹志鹃、王安忆母女是独特的。王安忆继承了母亲的文学基因,但与母亲的文学观念又完全不同。她是反叛的。她达到了母亲的高度,甚至超出了母亲的成就。目前,百度词条上的王安忆,是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上海作家协会主席,复旦大学教授;著有十余部长篇小说,以及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论著等数百万字的作品;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。王安忆与李章婚姻美满,相互扶持40余年,没有子女却感情深厚。他们物质生活简朴,但精神高度契合。李章负责买菜、洗碗、洗衣等家务,王安忆主理烹饪。李章长期接送王安忆参加活动,包揽后勤让她安心创作,还自学按摩缓解她的颈椎痛。王安忆则鼓励李章的摄影爱好,担任他的摄影模特,助其获得2021年上海“年度最佳摄影家奖”。

茹志鹃先生于1998年仙逝。今年是她百岁诞辰。她眼中的王安忆是令她欣慰和骄傲的二女儿,是徐州的媳妇,绍兴的外孙女。

灯如昼

(摄于彭城七里土城汉风片区)

通讯员 赵孝民 摄



板栗香里说丰年

◎王卫东

腊月里,灰蒙蒙的天空下,年的氛围已悄然漫开,像缓缓升温的水浸透街巷。我在“好想来”超市门口支起小摊卖印度线香、年货对联,摊子刚摆稳,老陈那辆锈灰色厢式货车就准时出现了。

老陈,五十多岁,一米八几的汉子,站着像棵挺直的白杨,浓眉大眼,头发黑密,脸上竟带着几分书卷气,笑起来眼角皱纹像阳光的纹路,半点不像常年奔波的摆摊人。

他利落地卸下车上的家伙:半人高的铸铁炒锅、一个煤气罐、大半麻袋板栗。炉火“噼”地燃起,蓝光苗舔着锅底,生板栗混着粗砂倒进锅,大铁铲开始有规律地翻动。起初是砂石摩擦的沙声,渐渐传来细密的噼啪声,热烘烘的香气便藏不住了。栗壳焦化的焦糖香混着坚果油脂香,霸道地漫开,瞬间盖过我摊子上幽微的线香气息。

老陈卖板栗从不吆喝,就坐在小马扎上望着锅里,油亮深褐的板栗在热砂中翻滚。香味便是最好的招牌。路人循着味来,“老板,来一斤”,他应着,铲起板栗上秤,分量总是高高的,装进牛皮纸袋递过去,总不忘叮嘱一声:“小心烫,捂捂手正好。”

我摆摊子是看世界写文章,没经验,生意冷清,常看老陈在那忙活。他闲时会铲袋热板栗放我摊位:“尝尝,刚出锅的。”一来二去便熟了,聊起天竟得知,他在我生活了半辈子的新疆待过整整十年。

“1998年那会儿,年轻胆大,听说新疆钱好挣,背包就去了。”老陈边说边拨弄着炉火,“在你们那开了5年超市,早6点开门半夜才关,辛苦是真辛苦,但那时物资相对紧缺,老百姓手头渐渐宽裕,生意不难做。”

关了超市后他去了伊犁开民宿,一开又是5年。“那地方真美啊!”说到伊犁他眼睛亮起来,“六七月份草原绿得像厚毯子望不到边,云白得晃眼,低得伸手能扯着。就是昭苏的夏,雨水一来潮寒钻骨髓,得让客人备毛毯薄棉袄,晚上围炉吃手抓肉看星星,那才叫得劲。”

我听得入神,他说的正是我记忆里又爱又怕的故乡之夏,既爱其辽阔壮美,又怕那变幻莫测的寒雨。“那咋回来了?”我惋惜道。

“为孩子呗。”老陈笑里有无奈更有坚定,三个儿子一个初中两个小学,都送徐州好学校读书,“这辈子就这样了,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徐州教育好眼界宽,为他们吃苦不算啥。”

老陈媳妇是徐州本地小学老师,留徐州照顾孩子,只他一人在外奔波。回老家沛县后他琢磨起炒货生意。“自由又能顾家,板栗要河北迁西

的,花生要山东大粒的,差点都不行。”一天备三麻袋花生、板栗,中午去各乡赶集,下午转去汉城公园、汉街,傍晚再来超市门口收尾。“留点几方便家门口卖,还能跟你这老新疆拉拉呱,那段日子想想还是甜的。”

炉火映得他的脸明暗交错,想起快过年了,我问:“老陈,年货备咋样了?”他哈哈笑:“那是媳妇的事,我负责挣年货钱。”问他一天能挣多少,他直言运气好净赚七八百,我哑舌,他摆手:“也就那节好,真正来钱快的是年前一周卖对联。”

我看了眼自己摊上的对联:“这本薄利小能挣多少?”“你不懂。”老陈一副深谙门道的模样,“年轻人都跟跟儿才买,现在张罗的多是老头老太太图早。等腊月廿五六,年轻人慌着备年货,谁还讲价?我开车往人多的地方去,薄利多销,那几天挣万儿八千不是吹的。”

这话像推开一扇窗,让我看清年味里的“经济学”:老人们提前描摹安稳年景,年轻人藏着汹涌购买力,明明白白地分成了两个梯队。

又过几天,老陈的炒栗炉果然不见了。他的货车停在超市对面楼下,车旁铺着压着砖头的大红布,上面用曲别针别满了对联,有长短不一的撒金烫线款,还有“福”字窗花,一片红色海洋,他高大的身影被映衬得像幅鲜活的年画。

寒风里,他哈着手招呼着行人。问价的,他麻利介绍;挑选的,他耐心展开。此刻的他不是炒货师傅,而是精明朴实的年货贩,藏着百姓的生存智慧:看准时机,用力气和头脑换来生活的希望。

我望着他忙碌的身影,心里滋味复杂。生活具体到板栗的火候、对联的定价、孩子的学费,没有太多诗和远方,多的是计算奔波与坚持。老陈脸上有生活磨出的粗粝,眼神却亮,腰杆挺直,不抱怨,把养孩子当奔头,这份韧性是沉默却强劲的正能量。

年关真像是一道关,闯过去便是团圆暖意。老人们用提前张罗闯关,年轻人用年末冲刺闯关,老陈则用整个腊月的劳作闯关。板栗的香是平常日子的温暖点缀,对联的红是年关冲刺的释放,这辆货车载着他的战场与希望。

夕阳为沛县街道和红布摊子镀上暖金,周围肉店的炖肉香混着淡淡板栗香飘来,这才是人间扎实的年味,有劳作辛苦,有收获期许,更有向前奔波的滚烫温度。

收摊时,老陈仔细卷起沉甸甸的红布,抬头看见我,远远地挥挥手,脸上仍是那抹带着阳光纹路的笑。我知道,明天他还会奔波在街巷,翻炒生活,售卖年景,奔向孩子们光明的明天。

我的母亲顾卿

◎刘章华

1923年的8月,我的母亲顾卿出生在江苏淮安朱桥一个贫寒的家庭。外公知书明理,却因眼疾失明;外婆多病卧床,生活难以自理。8岁的她,便已开始操持家务,照料病弱的外婆。12岁那年,外婆因病离去,母亲不得不到富户帮工,缝制旗袍等衣裳。那些年少的艰辛,未曾压弯她的脊梁,反而铸就了她一生坚韧勤勉的品格。

旧社会的苦难,在母亲心中悄悄埋下了革命的种子。1944年4月,年仅21岁的她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,她的命运便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。战争年代,她随游击队辗转奔波,在烽火中坚守信仰。我的大舅——游击大队长顾文藻,在那段残酷岁月里英勇牺牲,这份常人难以承受的失去之痛,她却以惊人的坚强默默承载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先后在基层、城关多个岗位工作,从区妇联干事到乡镇党委副书记,她始终脚踏实地,心怀群

众。下乡走访、调研企业,她常徒步往返,至晚八九点才匆匆回家用餐。上世纪50年代在扬州文化干校学习时,因基础薄弱,她彻夜苦读,加上工作劳累,一度病重。康复后她依旧奔走于乡间田野。多年后,早已离开当地的母亲,仍被乡亲们念念不忘,他们称她为“真正的党员、贴心的干部”。

母亲心善,见不得他人受苦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父母月薪不过百元,但家中三代同堂,日子并不宽裕。即便如此,母亲仍时常接济同事、帮扶群众,二三十元、一衣一食,在她看来都是应当。困难时期,一碗米汤或许就能救人性命,母亲常忍着饥饿,把口粮让给更困苦的人。她用一副柔弱的肩,与众人共担风雨,共筑家园。

而她对自己,却近乎苛刻。1979年前后,淮安老同事来看她,见她穿着带补丁的农服,脚蹬旧布鞋,不禁笑问:“什么年代了,还穿这样的衣裳?”母亲只是微微一笑,并不解释。她待人慷慨热情,自己一生俭朴,那种从内而外的朴实与随和,让她成了群众眼里最可信赖的人,也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依归。